

中国地区差距类型变化及其政策含义

蔡 昉, 贾 朋

[摘要] 21世纪以来实施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也对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计算和分解省际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泰尔指数表明,虽然地区发展差距仍然存在,但是其类型和特征与以往大不相同,正在发生着从具有发达与不发达二元反差的差距类型,到整体上更高发展水平上的多样化表现的变化。同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相应形成新的格局,政策重点也朝着多样化方向拓展。因应这一新格局,区域经济发展研究范式面临着从二分法到多元化的转换。与地区差距类型变化和研究范式转换相适应,在实施区域协调总体战略的过程中,应着力于实现向综合提升地区发展能力、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更加精细的区位界定,以及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政策取向转变。

[关键词] 区域协调发展; 泰尔指数; 地区差距类型; 范式转换

[中图分类号] F1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480X(2022)12-0005-09

DOI:10.19581/j.cnki.ciejournal.2022.12.001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区域发展问题时强调:“不平衡是普遍的,要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①这一辩证思维方法,是我们认识区域发展战略意义、评估实施效果、认识现状和挑战、理解局部发展和全局发展关系,以及部署和实施进一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各项战略和政策的根本指引。特别是在关于区域经济的学术和政策讨论中,只有应用这种辩证思维,才能既看到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实施以来取得的成就,也能够理解仍然存在的地区差距,认识到这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既坚持实施各种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又能够在战略部署和实施上,根据新发展阶段特点做到与时俱进。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相继提出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等区域均衡战略,旨在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由于当时的地区差距比较突出地体现在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之间,因此,这一系列战略的实施重点、政策手段、关键举措,都围绕着缩小三类地区差距部署和展开。与此同时,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加快了对外开放步伐,充分利用了经济全球化的高峰期,通过不断消除阻碍劳动力流动的体

[收稿日期] 2022-11-06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项目“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经济影响及政策研究”(批准号72141310)。

[作者简介]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贾朋,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力资源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通讯作者:蔡昉,电子邮箱:caifang@cass.org.cn。

^① 习近平. 论把握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第325页.

制障碍,把中西部地区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化为沿海地区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并在世界经济分工中兑现为产业和产品竞争力。很多研究文献都得出结论,过去20余年的中国经济增长与区域发展趋于协调是同步发生的(张军扩,2022)。

同时也应该看到,中国整体的地区发展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并且这种地区差距,与较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和整体收入基尼系数形成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关系,成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程中的一个必须突破的阻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研究在国内外发展环境变化中,现有区域政策哪些要坚持、哪些应调整。要面向第二个百年目标,作些战略性考虑。”^①国内发展环境的一个重要变化,体现在按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中国经济已经处在更高的水平上。按照世界银行的口径,2021年中国人均GDP为12556美元,基本达到12695美元这一最新高收入国家门槛水平。^②虽然这只是一个入门标准,并且还可能受到汇率变化影响而有所反复,但是,中国经济总体上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终究会在包括地区差距类型等发展特征上形成新的表现。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党中央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做出重大部署,指出了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所要推进的重大区域战略(习近平,2022)。根据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本文拟揭示以往区域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效果,在此基础上阐述中国面临的国内外发展环境变化。总体来说,中国经济已经到了这样的发展阶段,传统意义上的生产要素如资本积累不再是经济增长的绝对制约因素。因此,区域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不仅对区域经济学研究提出了新课题,还迫切要求研究范式的转换。本文也针对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提出政策建议。

二、区域均衡战略成效：理论和经验

学术和政策研究可以通过提供一些经验证据,揭示地区之间仍然存在着发展差距,但是,这些证据并不能检验区域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效果。也就是说,旨在检验区域发展战略的研究,不在于揭示地区差距是否仍然存在,而在于观察这一系列战略实施以来,地区差距是否显著缩小,以及政策成效背后所蕴含的经济学道理。从后一种分析可以做出的总体判断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东中西三大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得到了显著的缩小,因而也可以说,区域均衡战略的实施取得了成效。以下数据分析有助于整体来看这种区域发展格局的变化。为了与后面将要进行的分析相衔接,这里把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以下简称省份)分别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类地区,分三个时期来看各地区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以及各地区生产总值在全国GDP中的比重(见表1)。

从表1可见,进入21世纪以来,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明显加快,2001—2021年,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实际增长率都快于东部地区。结果是,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规模在全国的占比也有所提高。同时,在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整体减速的情况下,相比而言,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减速也相对温和。很显然,通过对地区经济指标的比较,从一般经济发展概念来说,中西部地区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对东部地区的追赶;从实施区域均衡战略的角度,特别是针对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战略来说,也可以说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① 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第323页.

② 详见世界银行网站(<https://blogs.worldbank.org/opendata/new-world-bank-country-classifications-income-level-2021-2022>)。

表1 分地区经济增长率和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 单位:%

地区	比重 1992	增长率 1992—2001	比重 2001	增长率 2001—2011	比重 2011	增长率 2011—2021	比重 2021
东部	48.7	12.9	54.1	12.0	54.0	7.3	53.5
中部	20.4	10.9	19.3	12.3	19.7	7.8	20.6
西部	19.7	10.1	17.5	12.6	18.4	8.0	19.5
东北	11.1	9.2	9.2	10.4	7.9	5.1	6.4

注: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

然而,既然已经把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单独作为一个分组,就可以看到,在相同的时期里,东北地区的相对增长速度和经济规模在全国占比,均呈现明显的下降。东北三省的GDP年均增长率相对于全国平均增长率的百分比,从2001—2011年的86.5%下降到2011—2021年的69.3%,三省GDP总规模在全国占比,从2001年的9.2%下降到2011年的7.9%和2021年的6.4%。东北地区是国家老工业基地的典型代表,在产业结构变革中遭受冲击,在一定程度上也算是符合一般规律性的现象。因此,数据显示的现状并不意味着东北振兴战略未奏效。实际上,所谓“新东北现象”是相对的,东北地区这些年的经济增长表现不尽如人意,只是相对于中国其他地区而言,从国际比较来说,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仍然属于赶超型的水平,不应完全等同于一些国家的“锈带”现象。

总体上观察中国的地区发展差距,人们很自然地注意到另一种新现象,即在东中西部地区差距缩小的同时,北方与南方之间的发展差异突出显现出来。实际上,这并非崭新的现象。至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北方15个省份的实际经济增长速度,就显著地慢于南方16个省份,导致北方经济规模在全国的比重,从1992年的43.0%下降到2001年的40.8%、2011年的38.2%和2021年的35.9%。虽然这无疑有东北现象的影响,但是,北方还有其他经济增长相对滞后的省份,经济规模在全国的比重同样呈现降低的势头。

现在,可以对中国的地区差距做进一步的统计分析。衡量地区差距可以采用不同的统计指标,完全取决于研究者希望从分析中获得哪些特别的信息。在这些备选的指标中,泰尔指数(Theil Index)具有一个优点,就是允许研究者把整体差距分解为组内和组间两部分贡献(Morduch and Sicular, 2002)。例如,一方面,以省份为单位衡量全国地区差距,泰尔指数取值大就意味着差距大,反之亦然;另一方面,如果把各省份分别归类于东中西三类地区之中,泰尔指数则分别由三类地区内的省际差距和三类地区之间的差距构成。把东北地区作为第四种地区类型加入到分解之中,也是同样的道理。可见,计算这个指数并进行分解,不仅可以知道地区差距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而且还可以得到地区内和地区间差距对整体差距的贡献份额。

利用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和分解泰尔指数,可以揭示出过去近30年地区差距及其构成因素的变化趋势。计算得出的省际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泰尔指数,先从1992年的0.145提高到2001年的0.183,随后下降到2011年的0.099,再进一步下降到2021年的0.080。把泰尔指数按照地区内和地区间进行分解,显示出在同一期间,地区内省际差距和地区间差距都是降低的,然而,地区内和地区间两种差距,对整体地区差距的相对贡献率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先来看按照东中西三类地区进行分解的情形。以1992年为起点,这一年地区内差距和地区间

差距对整体差距的贡献率,分别为41.9%和58.1%。到2001年,地区内差距的贡献率降低到39.4%,地区间差距的贡献率则提高到60.6%。2011年,地区内差距的贡献率提高到42.7%,地区间差距的贡献率则回落到57.3%。2021年,地区内差距的贡献率提高到54.5%,同时地区间差距的贡献率下降到一半以下,只有45.5%。这就是说,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和区域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均产生了缩小三类地区之间差距和整体地区差距的明显效果(见表2)。

表2 中国省际地区生产总值泰尔指数及其分解

年份	泰尔指数	按三类地区分组		按四类地区分组	
		组内贡献率(%)	组间贡献率(%)	组内贡献率(%)	组间贡献率(%)
1992	0.145	41.9	58.1	42.1	57.9
1993	0.159	37.7	62.3	38.6	61.4
1994	0.163	35.7	64.3	35.6	64.4
1995	0.164	36.7	63.3	35.9	64.1
1996	0.163	37.2	62.8	36.0	64.0
1997	0.169	38.1	61.9	37.3	62.7
1998	0.174	38.4	61.6	37.9	62.1
1999	0.180	38.3	61.7	38.0	62.0
2000	0.185	39.0	61.0	38.9	61.1
2001	0.183	39.4	60.6	39.5	60.5
2002	0.184	39.4	60.6	39.5	60.5
2003	0.187	40.4	59.6	40.3	59.7
2004	0.183	41.3	58.7	40.6	59.4
2005	0.178	40.6	59.4	39.7	60.3
2006	0.169	40.3	59.7	39.5	60.5
2007	0.159	40.7	59.3	40.1	59.9
2008	0.139	40.7	59.3	40.5	59.5
2009	0.131	40.7	59.3	40.2	59.8
2010	0.116	41.6	58.4	39.9	60.1
2011	0.099	42.7	57.3	40.9	59.1
2012	0.090	44.3	55.7	42.5	57.5
2013	0.084	45.7	54.3	43.7	56.3
2014	0.082	47.2	52.8	44.7	55.3
2015	0.085	47.2	52.8	43.9	56.1
2016	0.087	48.8	51.2	44.2	55.8
2017	0.087	50.7	49.3	45.2	54.8
2018	0.087	52.5	47.5	46.7	53.3
2019	0.085	53.3	46.7	47.1	52.9
2020	0.082	53.5	46.5	47.1	52.9
2021	0.080	54.5	45.5	47.4	52.6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

既然在传统的东中西三类地区划分之外,东北地区也成为—个显著的地区因素,特别是显示出滞后于整体经济增长水平的特点,人们很容易会想到,在三类地区内省际差距和地区间差距对整体地区差距的相对贡献率变化中,东北因素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换句话说,由于在东中西三类地区划分中,

辽宁作为东部地区、吉林和黑龙江作为中部地区,这三个省份的相对落后,在统计上形成了地区间差距贡献率下降,而地区内省际差距贡献率提高的效应。虽然这个因素无疑是存在的,但从分析中可见,即便考虑到东北因素,也不会否定地区内差距和地区间差距对整体地区差距相对贡献变化的基本趋势。也就是说,即使把东北作为一个地区分项,与东中西三类地区并列进行分解,也不会改变整体地区差距缩小、地区间差距贡献率相对下降,以及地区内省际差距贡献率相对提高的结论(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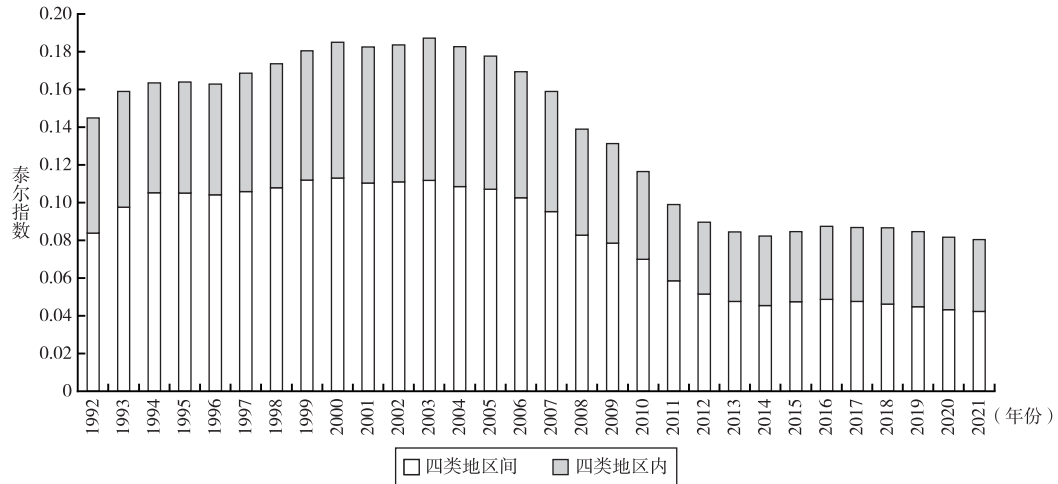


图1 地区生产总值的泰尔指数及构成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

三、地区差距格局：模式变化与研究范式转换

我们可以把观察到的这种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变化现象,放到一个更一般的趋势中观察,以便得出具有规律性的结论,推进区域协调的政策制定更加主动和自觉。经济史上有足够多的经验事实表明,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地区差距的类型具有本质性差异,因而形成大异其趣的特征化表现。这就是说,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总体上会对地区差距的类型产生影响,使地区差距特征的变化呈现一定的规律性。由于经济理论的实用功能与效力归根结底取决于能否适时、准确地对经济现实做出回应,因此,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变化而发生的地区差距类型改变,也提出了相关经济理论的范式转换要求。

一般来说,在经济发展的较低阶段,一个国家内部的地区差距,更主要地表现为一种二元划分的关系,即每个地区分别存在于丰裕与匮乏、富裕与贫穷、发达与不发达,或者具备发展能力与发展能力不足的二元反差之中。这种类型的地区差别,就其发生的原因来说,通常具有很强的确定性和显而易见的特点。也就是说,既然某些特征相似的地区不具备必要的发展条件,例如,极低的积累率导致资本的不足,持续地处于二元格局中落后的一极,既是不可避免的,亦可能顽固地陷于落后的恶性循环之中。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则是,那些具备必要的发展条件的地区,总是可以得天独厚地处于发展水平二元划分中的另一极,并且在良性循环中得以保持这种地位。

在发展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中,长期流行的各种流派和理论假说,在对这种区域发展模式或地

区差距类型做出智识反映的过程中,通常采用的就是这种二元划分的范式,其中不乏对区域问题做出影响深远的二元式分析的范例。体现这一研究范式,并且对人们关于区域发展的认识产生过显著影响的学术流派包括:19世纪经济学家杜能提出并阐释的“杜能圈”原理(杜能,1986);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1987)对“传统农业”的分析和改造传统农业的建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激进发展经济学广泛接受的“中心—外围”分析范式(迈耶和西尔斯,1988);至今对发展中国家仍然具有解释力的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模型(Lewis, 1954);源于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解释区域和国际要素价格均等化现象的“赫克塞尔—俄林模型”(奥林,1986),等等。

一旦国家整体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就会明显减弱,现代经济增长成分居于主导地位,这种二元划分框架越来越不适宜用来分析区域经济发展现象。由于生产要素的禀赋、积累、流动、配置和重新配置,都不再存在根本性的障碍,原来的贫穷地区或不发达地区,也就不再注定缺乏必要的发展条件。这时,地区差距仍然会存在,甚至可以说,地区差距是经济发展的常态现象,但是,这种差距不再具有非黑即白式的二元对立特点,而是表现出明显的多元化和多样化特征,落后地区仍然存在,但在区域分布上呈现更加随机的模式。也就是说,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化,影响地区差距的因素也将发生相应的变化。相应地,传统二元划分法的信息基础就不够充分了,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终归会陷入捉襟见肘的窘境。这时,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也面临着范式转换的挑战,即朝着更加关注多元化因素、更加具备多视角,以及更加统一的分析框架方向演变。

在关于经济发展和增长的理论流派中,那些超越了传统要素和二元对立分析范式,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新的研究范式因素的研究,可以被借鉴来分析这种更为多样化的区域差异现象。这方面,比较具有理论代表性和现实针对性的理论包括:克鲁格曼等从不同角度解释比较优势的新经济地理理论,以及相关的企业布局分析(Krugman, 1991);梯布特关于地方公共品供给模式影响人们选择居住地的模型(Tiebout, 1956);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以及关于“特许城市”的实验思路(Romer, 1990; 保罗·罗默, 2011);弗农(Vernon, 1979)的产业生命周期理论,以及相关的“雁阵模型”分析(Kojima, 2000),等等。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关于“条件趋同”的实证研究,通过回归找出多达“上百个”具有显著影响的变量(Sala-i-Martin, 1996),也同样有助于揭示多样化的差异因素。

四、区域协调战略新格局和政策重点

认识到地区差距类型的变化,并提出研究范式变化的要求,目的是在政策制定与实施中,更具有与时俱进和问题导向的性质。图1显示的中国地区差距指数的变化,大体上呈现一个倒U字形轨迹,即随着时间的推移或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地区差距先表现为扩大的趋势,在到达峰值之后则转而逐渐缩小。这里,本文不拟对于是否存在所谓“库兹涅茨曲线”做出严格的判断。不过,从这个变化轨迹中,仍然有把握陈述两个事实,并解读其政策含义。一是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无论持续时间多久,终究是可以遏止并转而缩小的。然而,这个转折点不是自然而然到来的,差距从扩大转向缩小的转折,与实施区域均衡发展战略直接相关。二是在地区差距形成原因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原来部署的那一套旨在解决特定任务的政策举措和手段,会显现效果递减的趋势,要求顺应变化了的条件,在战略上做出新的部署。

换句话说,在地区差距具有二元划分的特征,主要产生于相对落后地区缺乏诸如资本积累等必要条件的前提下,通过倾斜性政策帮助这类地区获得瓶颈要素,进而形成资本积累的良性循环,可以产生临界最小规模的推动作用。一旦地区差距不再显著具有二元划分的性质,在缩小差距的做

法上,就难以找到一把“万能钥匙”了。地区发展格局和模式的变化,要求以更具整体性、综合性和动态性的视野看待区域经济发展,在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和与时俱进地做出新的战略思考。准确理解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最新战略部署,认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思路的内在逻辑,把握国土空间体系的顶层设计和全面布局,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推动政策转变。

第一,从补要素短板为取向的倾斜性扶助战略,转向实施综合提升发展能力的全面战略。在早期发展经济学文献中,无论是被称作平衡发展战略,还是被称作不平衡发展战略,旨在以大规模投资拉动的地区发展战略,本质上都是冀图以不平衡的政策,推动形成平衡发展的格局(迈耶和西尔斯,1988)。地区差距的缩小,通常就是要经历从二元划分的整体不平衡,到多元化的局部不平衡的稀释过程,最终达到相对平衡的动态目标。这时,战略的制定和实施相应转向以相对平衡为直接取向。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上,这种战略理念和实施举措的转变,总体上越来越全面地体现了新发展理念的要求,并且纳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具体目标之中。

第二,从政府主导各种投资和建设项目的政策取向,转向政府着眼于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构建要素充分流动和有效配置的体制机制,促进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在地区差距具有二元划分特征的情况下,相对落后的地区迫切需要获得稀缺资源,政府通常着眼于填平要素禀赋缺口,重在硬件建设。一旦这种资源或要素的持续性稀缺特征消失,“一把钥匙开千把锁”的思路也就不再奏效。政府需要转向制度建设,营造激励相容的格局。这样,相对落后的地区或者因各种原因一时陷入困境的地区,处于一种能力建设阶段,以便有足够的力量,以最大的可能性,找到、创造并抓住任何逆袭机会,例如发展一个特色产业、营造一个不胫而走的宜居排名、建设一个化腐朽为神奇的老工业主题公园等,进入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第三,从实施基于宏观层面大板块划分的区域均衡发展战略,转向进行更加精细的区位界定,更加面向地方特殊难点和比较优势,部署更具体有效的政策举措。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整体性、多元化、丰富性、立体感的增强,中国解决地区差距的新战略已经处在这样的演进过程中。例如,根据张军扩(2022)的概括,在以四大区域板块为特征的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主体功能区规划管控制度,以及更具体的功能区域或特殊问题区域战略基础上,党的十八大以来进一步完善、拓展和深化了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在区域发展方面取得了新的成效。概括起来,在实施针对中东西、东北地区和沿海地区的区域均衡战略基础上,国家还部署和实施了主体功能区、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海南、成渝等区域,以及长江和黄河两大流域等区域重大战略;“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布局和多核多层的城市群战略;促进内外联通、对外开放和国内区域均衡相衔接的“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针对特殊目标和功能的地区设立的开发区、试验区、示范区、引领区、新区等;支持欠发达地区、革命老区、边境地区、生态退化地区、资源型地区 and 老工业城市等特殊类型地区的政策。

第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在所有地区的均等覆盖,实现地区发展水平与社会保障和其他基本公共品的可得性脱钩,保障全体居民基本生活质量同步提高。无论是经济周期的冲击、产业结构的变化,还是比较优势的转换,都具有地区性的特点。因此,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总是会产生,区域发展的要义就是在不断解决不平衡的过程中趋于相对平衡。与此同时,各种从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的调整,作为发展方式和增长模式的新旧转换过程,都具有创造性破坏的性质。没有这个优胜劣汰机制,就无法实现地区发展的“凤凰涅槃”。然而,一方面,地区差距造成生产要素特别是人口和劳动力的流失,也会伤害地区的长期可持续增长能力,妨碍其回到正常发展轨道;另一方面,作为生产要素载体的劳动力和人口,任何时候都应该受到社会保护,获得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享有社会必要的生活水平。

五、结语

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进入这样的阶段,从大板块的区域划分概念看,无论是要素市场的发育水平,还是政府宏观调控和转移支付政策,都意味着已经没有任何一类地区持续存在缺乏必要发展条件的问题。与此相应,现存的地区差距,主要表现为单个的地区,由于局部性、独特性和非系统性因素形成的发展相对滞后现象。尽管如此,地区发展差距仍然是我们所不希望看到的结果,例如,它的存在具有收入差距扩大、生产要素流失、生活质量均等化水平降低、现代化进程不平衡等不良效果,构成一种恶性循环的新形式表现。因此,因应这种地区差距类型的变化,既需要转换研究范式,也需要改变政策思路,创造和选用新的政策工具,以不断消除新的地区差距。

不同的区域发展模式和研究范式,并不会像白天和黑夜转换那样非此即彼,必然的转变也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归根结底,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是这些转变的前提,既有质的界定,也靠量的积累。与时俱进地把握中国区域发展面临的挑战,要求拓宽认识新问题的视野。既然地区差距不再能够以二分法界定,大而化之的政策必然具有实施效果递减的性质,需要找出更具有地方特性的原因,使政策应对更具有特别的针对性。在那些存在问题的地区找到恰当的解决思路之前,政策应该对居民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保障,同时创造要素充分流动的体制机制,改善营商环境和消费便利性,使市场主体和人力资源保持运行能力和首创精神,能够抓住潜在且稍纵即逝的脱困机会,实现后发赶超。

〔参考文献〕

- [1] 保罗·罗默. 何不推行特许城市[J]. 财经, 2011, (16): 28-29.
- [2] [瑞典] 伯尔蒂尔·奥林. 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M]. 王继祖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 [3] [美] 杰拉尔德·迈耶, [瑞典] 达德利·西尔斯. 发展经济学的先驱[M]. 谭崇台译.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8.
- [4] [美] 西奥多·W. 舒尔茨. 改造传统农业[M]. 梁小民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7.
- [5]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 [6] [德] 约翰·冯·杜能. 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M]. 吴衡康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 [7] 张军扩. 中国区域政策回顾与展望[J]. 管理世界, 2022, (11): 1-11.
- [8] Kojima, K. The “Flying Geese” Model of 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Origin, Theoretical Extensions, and Regional Policy Implications[J].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00, 11(4): 375-401.
- [9] Krugman, P.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1, 99(3): 483-499.
- [10] Lewis, A.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J]. *The Manchester School*, 1954, 22(2), 139-191.
- [11] Morduch, J., and T. Sicular. Rethinking Inequality Decomposition, with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J]. *The Economic Journal*, 2002, 112(476): 93-106.
- [12] Romer, P.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98(5): 71-102.
- [13] Sala-i-Martin, X. The Classical Approach to Convergence Analysis[J]. *The Economic Journal*, 1996, 106: 1019-1036.
- [14] Tiebout, C.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6, 64(5): 416-424.
- [15] Vernon, R. The Product Cycle Hypothesis in a New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J].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79, 41(4): 255-267.

Changes in the Pattern of Regional Disparities and Implications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gional Policies

CAI Fang¹, JIA Peng²

(1.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 CASS)

Abstract: Since entering the 21st century, China has put forward the Western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 Rise of Central China Strategy, and the Strategy for Revitalization of Old Industrial Bases in Northeast and Other Areas of China to balance regional development. Over the past twenty year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strategies has been very successful and contributed to China's overal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same period as well. Recently, the Report to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ade a significant deployment to promote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aiming at developing a regional economic layout and a territorial space system that complement each other's strengths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is context, this paper first evaluates the effects of implementing previous strategies to balance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n, it discusse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changing stag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for changes in the pattern of regional disparities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such changes for a paradigm shift in economic research. This paper also puts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for implementing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the future.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economic growth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has accelerated significantly. From 2001 to 2021, the real economic growth rates of provincial region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were faster than those in the eastern region. The economic size of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s a share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has also increased as a result. It is fair to say that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have achieved catching up with the eastern region, and the strategies to balance regional development, especially those designated for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have fulfilled their overall goals. The trend of the Theil index calculated using provincial-level per capita gross domestic product also verifies this conclusion. Decomposing the Theil index reveals that both the between-group and within-group regional disparities are decreasing. However, a clear trend is that the contribution of within-group disparities to the overall disparities has approached or even exceeded the contribution of between-group disparities, indicating a change in the pattern of regional disparities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shows that chang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can impact the pattern of regional disparities. In general, at a low stag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regional disparities within a country manifest themselves more as a dichotomous relationship, where each region exists in a dichotomy of abundance versus deprivation, affluence versus poverty, developed versus underdeveloped, or having the capacity to develop versus not having the capacity to develop, respectively. Once the country enters a higher development stage, the dual economic structure becomes significantly weaker. Furthermore, the modern economic growth component becomes dominant, making this dichotomous framework increasingly inappropriate for analyzing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ssues also faces the challenge of shifting toward more attention to diversified factors, more multiple perspectives, and a more unified analytical framework.

In line with the changes in the pattern of regional disparities and the shift in research paradigms,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the overall strategy of regional coordination in the future, more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achieve policy changes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 it is necessary to achieve a change from a preferential support strategy oriented to make up for factor shortcomings to a comprehensive strategy to enhance development capacity. Seco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change its policy orientation of government-led investment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s to focusing on creating a good business environment. Third, it is necessary to change from a 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based on macro-level segmentation to a more refined definition of developed and underdeveloped regions. Fourth, it is needed to achieve equal coverage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in all regions.

Keywords: balanced development among regions; Theil index; attributes of regional disparities; paradigm shift

JEL Classification: P25 R11 R58

[责任编辑:王燕梅]